



日本對於我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反對 葉作舟

政院主席墨西哥代表那吉拉任主席，計有八國代表參加：

中國 宋子文 顧維鈞

德國 凱勒

西班牙 河里文

英國 哈衛

意大利 波恩休里

法國 瑪西格里

捷克 阿索斯基

美國 麥里內

國聯與我國的技術合作，其起因很早，一九二七年現任國聯祕書長阿蒲諾爾氏來華視察，結果，一九二九年乃有拉希曼博士的來華，對中國的衛生設施與海港檢疫作實際的援助。其後應招來華者有哈斯氏，作關於交通政策的商討；有蘇爾德氏，作關於經濟財政問題的商討。這其間國聯與我國的技術合作，已漸漸醞釀成熟，所以一九三一年五月國聯理事會應中國的請求，經討論之後，案遂確立。此後經過情形與

合作的性質範圍，本年本誌夏季特大號中柏文治君已有過詳細的介紹，茲不復贅。但在這裏，我們在敘述日本的反響之前，此案最近的發展，實不能不提一提，庶幾對於日本的中傷與破壞，可獲得更明白的認識。

國聯行政院最近應中國政府的請求，又組織了一個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於本年七月十八日在巴黎召集會議，由國聯行

92072 聯會各種技術機關的運用，以及此等機關如何能援助中國從事建設的消息，報告中國。（二）凡中國政府請求技術上援助時，應轉達國聯祕書長。（三）中國政府為建設事業，需用技術人員的合作時，該聯絡員對於此事應援助中國政府。（四）出席中國全國經濟委員會，以便就地使國聯會各技術員的行動，得以協調；技術聯絡員應將其執行任務情形隨時報告國聯會行政院，每三個月，至少須呈送詳細報告一次。

委員會的決議案，最後並謂以後該委員會為下列各事，聽國聯行政院的指揮，即（一）中國政府如再向國聯會請求技術上合作以謀中國的建設時，行政院對於此事的一切問題，得交技術建設委員會討論之。（二）國聯會收到技術聯絡員各種文件及報告書時，得交技術建設委員會討論之。

自此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一方面既已有具體的決議，一方面更設有專門委員會以處理一切，已顯然發展到進一層的階段。而聯絡員拉西曼博士傳已決定偕財長宋子文同行來華，將長駐南京，進行國聯所賦與他的任務。

不可逸出技術的範圍；（二）國聯的對華援助，只可於理事會統制下實行。所以外務省根據了這諒解事項，對於此次國聯決定對華技術援助，換中的中日關係局面以惡影響。日人這種表示，實無異聲明日本對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自始即站在反對的立場，所以不惜引用過去的保留條件，而竟忘卻自身已非國聯的會員國了。

駐華日使館的須磨石的談話，更有露骨的恫嚇的表示。他說：「日本與中國無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均有特殊關係，尤以爲亞洲的地位，日本素係願意努力幫助中國之發展者，現在中國乘近友而就遠，其含意無非仍爲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將來國聯與中國合作，若萬一有政治作用的表現，則日本將如何應付，目下不能明言，釀成第二「滿洲國」的出現，第二上海事變的發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證其必無。」須磨氏這一番意氣凌人的談話，真令人不解。他代表日本以中國的「近友」自居，「素係願意努力幫助中國之發展者，」但事實在那裏呢？難道就是二十一條嗎？難道就是各地所造成的慘案嗎？難道就是向國際宣傳中國爲無組織的國家嗎？而未復以危辭相恫嚇，外交人員竟作軍閥口吻！

巴黎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決議案公佈之後，日本方面即連續的向各方面作破壞運動。他們最初表示：一九三一年的國聯會議，曾由日本代表芳澤贊成，但附有如下的保留：（一）國聯的對華援助，絕對

各國對華的經濟援助，與國聯對華的技術合作，本爲一事之二面。華府會議時，我國與美國間有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的成立，及宋子文氏赴歐，一方面傳與歐洲各國有借款的進行，一方面國聯有技術合作

決議案的成立，這使日本不但以凌厲無比之辭相恫嚇，而且更進而作具體的破壞的企圖，所謂西原借款，本來是日本與中國反動軍閥相勾結，用以宰割中國摧殘中國革命的借款，中國向不承認，不料日本竟利用西原借款，以爲借題發揮之計，說「中國利用歐美的投資以抗日，而其借款且難保不以西原借款的抵押品爲二重三重的擔保，故日本及關東軍方面，已準備於形勢最惡的場合，以武力扣押全中國有線無線的電報電話。」雖則這番說話尚未有日本政府加以正式的證明，但日本軍部有此意圖，已爲事實。

最近日本軍部又發表關於國聯與我國合作的意見，竟謂已入與英美對立的最後階段，要求日本國民奮起，迫外務省採取必要的步驟。談話的內容甚長，節錄其大綱如次：

- (一)宋子文氏在歐美的活動，日本朝野多以借款爲實，據軍部所得消息，宋氏工作在全局的合作，拉攏英美爲後盾，對抗日本。
- (二)宋氏的外交，隨已得到意外的成功。
- (三)現在的局勢已非中日的對立問題，日本朝野須認清宋氏歸國的形勢，已入日英與日美全局對立的最後階段，在此認識下，準備一切。
- (四)蔣介石氏必接受宋氏的對日政策，而且華北的親日派，將無立足餘地。

日本軍部想藉此煽動國民，擴大事態，已不言可喻了。

日本的企圖破壞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對中國既一再力肆恫

嚇，對各國及國聯亦採取了同樣的手段。在巴黎國聯技術委員會開會的前一日，日內田外相，企圖先發制人，電命駐外各使，積極妨害各國與

我國的合作。訓電的大意，可概括爲兩點：第一，中國在歐美各國的借款運動，若各國誤信爲單純的商業借款，而應中國的提議，則錯誤莫大於此；貴大使須喚起駐在國政府的注意，並講究必要的對策。第二，前項借款，明白地在華助長各種特殊勢力，激成中國的反「滿」抗日，引起中日間的新禍因，終爲擾亂遠東和平的工具；貴大使須闡明此事，如各國不肯放棄其助華政策，則切實聲明，若因此而惹起中國的決行反「滿」抗日行爲，則日本不辭再取滿洲上海兩事變一類的自衛行爲，對於中國予以援助的國家，應均分其責。

日本對於國聯，一方面由外務省致電國聯祕書處，阻止對我國的技術合作，一方面又電命伊藤述史向國聯祕書長亞蒲諾爾表示日本政府對國聯援助中國的態度。國聯的答復是：各國與中國的技術合作，從前已有先例，並非始於今日，而且合作範圍，不涉及政治，國聯不能接受此種抗議。亞氏的答覆謂：此次決議，完全對於中國僅爲關於技術方面的援助，毫無政治的意義。國聯方面的這種答覆，在日本當然以爲是丟臉的事，故意與日本爲難，所以決準備再取有效的阻止方法，妨害合作。自國聯對華技術合作決議案發表以來，爲時不及一月，而竟招致了日方如此嚴重的反響，來日大難，不難想像而知了。

國人加以討論，或反或正，全爲中國自身事，初無關於日本，但日本竟敢力肆恫嚇，各方面作中傷與破壞運動，這也自有其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我們所不可不了解的。

我們先來觀察國際政治間日本所處的地位。

日本自脫退國聯後，雖然高唱『孤立不足畏』論，中野正剛說：『日本國民對於英美俄都應該正正堂堂，不屈不撓，毅然表示絕對孤立的信念，這是日本在退盟後，整齊步調的唯一先決條件。』但是實際的日本，果然有這樣的精神嗎？我們敢說，決不。關於脫退國聯的日皇詔令中，就已告訴我們：『今與國聯分手是從帝國之所信，非偏於東亞而疏友邦之誼，蓋愈敦國際信用，顯揚大義於宇內，朕所夙夜念茲者也。』

最近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外交的動向，第一對於英國，因了棉織品

市場的爭奪戰，雙方已到了無可和解的地步。她們兩國雖然有過十九年的同盟關係，但在遠東的利益一點上，始終立在反對的地位，英國決不願日本在中國獨佔其利的。第二，日本與英國在現狀下決無妥協的可能，這是很明白的事實，所以我們聽到一片『排英親美』聲了。華府會議時，石井菊次郎就負了這個使命去說動羅斯福，但是日本的夢與美國的夢，從來沒有一致過，日本的大陸政策與美國遠東門戶開放政策，常常迸裂出火花來的。

英美日三國關係的尖銳化，海軍競爭就是表現的一端。國際外交

的轉變無常，本來是難以臆度的，但就現在情形看，日本實不能不說爲

『滿洲國』一方面極力向外發展貿易。

但是爛熟的資本主義國家，到底非僅僅採取了自給自足的經濟

『孤立』所苦悶着。最近日本所引爲一大勝利者，即爲塘沽停戰協定的簽訂。這協定的簽訂造成了日人所謂『轉換中的中日關係局面』，使他們可以積極進行日『滿』經濟聯合與對華的所謂『親善』政策，造成亞洲大陸國更一層穩固的基礎。在這好夢正濃時，忽有美國對華大借款的成立，國聯技術合作的決議，這在日本是無異一晴天霹靂，日本軍部『日美與日英對立』的觀察，並非是全無理由的。

再退一步講，國際對華合作，純爲技術的性質，而不涉及政治，其執行一如決議案所規定，但這依然將爲日本所嫉視。何以故？中日過去的關係，就足證明日本無時不想利用中國紛擾的局面，攫取漁利。國際對華之經濟的或技術的援助，在中國是爲發達國民的生產，充實國力，這當然不爲日本所快意的。

其次就國際的經濟關係來看。

長期的世界經濟恐慌，經過倫敦世界經濟大會的醫治後，非但並無回春的氣象，反而促進集團經濟的對立，使之益見尖銳化。就遠東市場關係最切的英美日三國來看，英國以《太華協定》爲根據，對於他所領導下自治領地以外諸國，極力提高關稅，防止外貨的輸入。美國一方面進行與南美諸國新通商條約的締結，一方面策劃與斯堪狄那維亞半島諸國互相提攜。日本近則積極向着外交的經濟邁進，一方面抱住

國家主義所能維持其生存的，所以於高築關稅壁壘之外，尚須繼續開拓國外市場。而所謂國外市場，在今日，亦只剩了亞洲方面的中國、印度、蘇聯三處了。

印度爲英國所決不願拋棄的市場，蘇聯的貿易則受國家權力的統制，所以今日列強所欲爭奪的唯一市場，唯有中國而已。

資本主義國家的眼光是很犀利的，他們明白一隻母雞要她生蛋，尚須給一點飼料，中國的市場自九一八以來，實在已失去購買力了，也應給一點『飼料』。國際對華的經濟援助與技術合作，其實不無飼料作用，含在裏面。美國呢，借款成立了；英國呢，他所操縱下國聯技術合作案通過了；而幾十年夢想着獨霸中國市場的日本，致遭向隅，這難道還能忍着不起來反對嗎？

四

日本的反對我國與國際的合作，本來『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但合作一事，我們自己亦不可不審慎從事。或以爲蘇聯的興國，亦藉外國的資本與技術，但這在處在資本主義國家宰制下的中國，不能一概而

論，東印度公司的經營印度，國聯的共管奧匈，都是前車之鑑。

汪精衛氏對於日本的反對，曾負責聲明：

『中國感於建設之需要，與物質之缺乏，確有與世界各國增進經濟與技術之關係的決心，此在中國爲自存自立計，固應如此，而在世界各國爲共存共榮計，亦決不認爲非策，但我們有自知之明，在現時積弱的形勢之下，一切聯甲制乙等等政策，無論爲合縱爲連橫，部不足以擾人，而適足以自擾。我們痛感於國力不振，不但不能與人言抵抗，且亦不能與人言親善。而且我們若沒有相當的國力，也決不會有人來聯我們，以對於其他的，我們認定今日救國，惟具備真實力量，不存奢望，不存僥倖心。我們現時需要真實力量，是用以自救，不是用以害人。我們今日力量未足時，是如此決心，他日若幸而有力量充足之一日，這決心也是不變的。』

誠然，中國需要建設，缺乏物資，我們希望中國由增進國際經濟與技術關係的階梯，而能達於自存自立的境域。但我們亦不可忽視國際資本主義國家之需要中國衰退市場的再建立，日本的反對歐美與我國的合作，要亦脫離不了資本主義國家間明爭暗鬭的又一幕。『在現時積弱的形勢之下』的中國應如何慎重考慮與處置，以避免加深次

一一·八·一〇。

